



LIERZHONG WENJI

李尔重文集

第十七卷

作家出版社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第十七卷

李尔重文集

宗平题

作家出版社

(十二)学而无厌

周恩来一生都是忙人。他把大政方针当大事挂在心上,抓在手上;他把工作中和同志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也挂在心上,抓在手上。进了八办的门,还没有坐下,就问:“是不是给白求恩同志预备了夏衣?天已热了。”听说孩子剧团要在剧场跳舞演出,未演之前,他就去了。问管场的同志:“地板是光滑的么?”管场人答复个“是”字。周恩来同志脱下了鞋袜光着脚在地板上转了若干圈,满意地笑了:“可以,没有钉子尖。”

他听了董老的报告,顺利地做了高敬亭的工作。笑了:

“本来嘛!四方面军同志都是为革命来的,你张国焘不革命,四方面军同志们还是要革命的嘛!在延安的成千累万的四方面军同志们认识了张国焘的真面目后,还不是继续战斗下去。好些同志已经开赴前方作战了,打得有声有色嘛!”

记者们总喜欢围着他。可是,今天他婉言谢绝了接见他们,因为武汉大学学生会来请他去作报告。

“这一次您再忙也要去一次,不然我们拉着队伍来把您抬去。”

“这么厉害么?为什么?”

“有一批同学要上延安,您总得给他们送送行啊!”

“好,好!”

张郁光、袁仲贤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去学习。

武汉大学位于山丛之中,那个地方原叫罗家山,文人们嫌它不雅,改名为珞珈山——借用了观音菩萨的居处作了名字。观世音并没有到过这里现身说法。山,坐落在清澈的东湖边上,这里树木葱茏,掩隐着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和一些布达拉宫型建筑,构成了武汉三镇的一个景点。

不解忧愤的杜鹃,很快地忘记警报声和轰炸声,在密林深处照旧歌唱。周恩来带着张郁光、袁仲贤在学生的引领下,在热烈的掌声中跟站

在讲台最前列的将赴延安的青年们，一一地握过手。和平时一样，他洒脱地登上了讲台。他没有装腔作势端着架子扫视台下的青年们，随便地抹了抹正在外冒的汗珠，叙家常的语音流了出来。

“咱们空军连着打了胜仗，全国的人民，武汉的人民都高兴。你们也一定高兴吧？”周恩来歪了歪头，笑出个问号。

“高兴！”青年们响亮地回应。

“所以，这一伙积极分子扛起了背包要上延安，要到前方去。他们的行动，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不？”

会场上静静地张开了一双双企求的眼睛。

“我告诉你们！那就是：现阶段青年的任务。”

学生们懵住了，张郁光也不知道周恩来要讲出什么来。张郁光这一时在武汉看游行、唱歌、演戏、集会、宣讲，写不尽的慷慨激昂，看不完的轰轰烈烈。他一直以为这就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或者说这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袁仲贤知道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叶剑英心里的群众运动跟王明心里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回事。短不了给张郁光洒点冷水：

“光在城里唱歌、游行就能把鬼子赶走？”

“那你说这些都是不必要的？”

“不但必要，而且重要。我是说以此为满足，则不够。”

董必武早已在袁仲贤面前评论过王明认为满意的武汉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其表，空空洞洞其实。”袁仲贤但愿张郁光自己慢慢认识这点，从来不愿去勉强别人。张郁光将信将疑、似清又浊，一听到周恩来点出了题目，便直直地竖起了耳朵。

“我们要战胜日寇，必须发动全民抗战，单靠几个正规军片面抗战，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到哪里去发动？光在城里不行，中国的人民绝大多数在农村，在平原，在海边，在山沟……”

张郁光要听的是：怎样才算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周恩来还没有正面给出答案，他的话又顺畅地淌了下来。

“在发动群众中，青年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因为你们年富力强。你们应该到军队里去，到战场服务队去，到乡村中去，到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勇毅地、默默地、艰苦地、深入地去发动群众。……”

一个青年举起了右手，毫不隐讳地提出一个问题。

“周先生！我们离开了娘的怀抱就进了校门，我们走的路一直在校门和家门之间，说实在的，还不大了解怎么发动群众，什么叫群众运动。您能给讲讲么？”

张郁光的心里笑开了花：“问到点子上了！”

群众运动就是整个的革命运动。周恩来知道：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毕生学习和钻研的学问。他自己也当过学生，而后参加了革命。开始革命时，除了有一股反对旧社会腐败、要求救国的热情之外，心灵深处也是一张白纸。以后下了“十年面壁图破壁”功夫，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眼睛里才见到光明；又经过了多少胜利和失败的磨练，眼界才开阔起来。

“年轻人理应这样提出问题。我也没有可能在一次报告中给讲清楚。”周恩来想找个简而易明的道理，给开始入世的年轻人一点信心。他爱抚地看了看这个青年，笑道：“你们是大学生，我给你们念几句书上的话。‘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这是《礼记》上的话，实践会答复你们的问题；‘为者常成，往者常至’。《晏子春秋》告诉我们只要努力不懈，必能奏效；‘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宋史》上的话说群众是你们出校后的授业师。书不可不读，读书的目的在实践，实践的成败，在于与群众多谋少。”

张郁光和那群学生一样懂得了要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发动群众，但不知从何处入手。张郁光耐不住了。

“您也给说说入手的要领呀！”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大家指出了路子，所谓发动群众就要按十大纲领的要求去办：组织起来，使人民有抗日之责，也有抗日之权；给人民以民主，建立抗日政权；给人民以武装，壮大人民军队；给人民改善生活，使人民有生活条件。人民成了抗日的海洋，淹死日寇。”

学生们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张郁光心底踏实了许多。袁仲贤小声地问他：“这回讨到了底了吧？”张郁光笑了一下，紧接着倒抽了一口气，似乎又在想什么。袁仲贤知道：文化人惯于敏感、多思、激动，没再向他说什么。周恩来却在大家感到满足时去填充他们未感觉到的

空洞了。

“敌人已经攻占了上海、南京和华北，眼看着又要占领徐州，形势逼人。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争；敌人已在攻击晋察冀边区，攻击晋冀边区，企图挫败我们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与信心，我们必须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并在全国的敌占区创造更多的游击根据地，生长更多的抗日武装，来回答敌人的围攻，吸引更多的敌人回敌后去，才有利保卫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同志们！你们到敌后去，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举起右臂高喊：“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声震屋瓦的和声卷起了激荡的浪潮。青年们围着周恩来要求签名。一个瘦细身材、白皙面孔的青年得到了签名之后，拉住了周恩来的手，几乎要哭地问道：

“以后就不需要上学了吧？”

周恩来一愣。那个青年人眨着的眼睛望着他，手仍然抓得很紧。

“到前方去，在火热的大学里会培育出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总之，数不清的治国人才。在后方，有爱国心的人，致力研究，也将培育出大批专家，治国人才。这都是建立新中国的需要。但人的一生，都是毕业以后才取得最大的学问的。是么？”

蒋介石少年时喜欢打架闹事，喜欢玩龙灯上会；壮年则投身股票市场，在大搞股票投机中悟到了政治投机中权势与金银的不解之缘。在上海滩交易所里打了败仗之后，南走广州，傍住了孙中山这杆大旗，在中山舰上押了一宝，押中了红，得到中山先生的信赖，从此扶摇直上，攫得了大权。他是“刘项从来不读书”之辈。

戴笠走进门，被一个异样的情景吓呆了，既不敢喊“报告”，也不敢碰马靴的后跟。

蒋介石在透过纱窗的阳光照耀下，敞着怀，双手捧着一份申报，敛气凝神，渡入了化境，这是戴笠从来没有见过的。

蒋介石转身把报纸平铺到桌上，用红蓝铅笔，在两句话下狠狠地划

了两条红,接着把桌子一拍,叫了一声“好”。

一转身,他看见了戴笠。

“雨农!你看!章乃器果然有了进步。你看!”

在蒋介石的手指下,戴笠看见了两行字:

“国策的详细内容和大政的具体步骤,人民是不应该要求知道的。”

“绝对不能主张船客可以去干涉舵师的职务。”

戴笠同时也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少号召,多建议”。戴笠莞尔而笑。

“你笑什么?”

“您不知道还有一个人比章乃器还进步呢!”

“谁?”

“共产党的王明。他很赞成这篇文章,并作了注解。主张‘求同而非异’,主张不管在恢复区域或其他区域……‘一切行政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戴笠忽然改用说悄悄话的声音贴住蒋介石的耳朵说:“他还赞成派丁维汾去当边区政府主席呢!”

提起了丁维汾,蒋介石的脑袋里马上蹦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着共产党不但拒绝接受丁维汾,而且拒绝国民党向红军里派干部;只给八路军三个师的限额,他却领导着共产党在华北、山东,在一切国军撤走的地方,大肆发展武装;长江下游的新四军也像春天的野草,到处长起。他不可遏止地想起了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反五次围剿中的毛泽东,“四·一二”大屠杀后,从血泊中崛起的毛泽东。这一串联想把刚才升起的兴致,一股脑儿都给吹走了。

“只可惜多了一个毛泽东……”

“长江局还是王明牵头的。”

“他也未必能压住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叶剑英……这一大串毛泽东的追随者,不是在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其他党派合法存在’,‘发布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么?他们总喜欢多些人跟他们起哄,总想对三大政策借题发挥。暗处难防,明处更难防。你们的任务是双重的,双重的。”

“学生懂得委座的意思,是在明处暗处都下功夫的。”

“特支费不要单花在暗处。”

“是的。各报馆、各社团、各名流方面，都要照顾照顾。”

“不说一言九鼎，也应说一字千金。比如张国焘能揭露共产党一句，就胜过我们说十句。让他吃好一点，不要在这方面吝啬，贪利小则大利不成。”

“有人已经认为共产党扩大武装是两党互信的障碍，并且给毛泽东写了信。”

“应该促他发表文章，应该成十倍地付给稿酬。”

陈诚来了。一见戴笠，两眼便竖了起来。

“雨衣！你的招数都用到哪里去了？”

“辞修兄！有话请明说。”

“你应该知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干什么的吧？为什么由他自由蔓延。”

“辞修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共产党显露原形的地方，我没有不安上眼睛的。要了解他们的内部情况，我可以提供无误。至于大面上是收是纵，那不是省政府的事么？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倒是想建议明令取缔。”

“取缔命令已经拟好，不抽掉他们的筋骨，他们又会乔装打扮，再生事端！”

“抽筋骨，手到擒来。只是八办又要借题喧腾……委座，您看？”

蒋介石好像没有很注意陈、戴二人的交谈。他还在玩味《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绝对不能主张船客可以去干涉舵师的职务”，本来嘛，为政在德，众星拱辰。北斗七星的任务生就了就是围着北极星转的，共产党偏要反其道而行，那不是要天下大乱？况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有明训，共产党偏要不遵圣训，“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病人腠理，梗在喉中，生命有危，君子居安而思危。蒋介石想得很多，心游于九天之上，听到戴、陈絮语，颇笑他们坐井观天。

“小事一桩，发个布告就完了；捣乱分子，抓起来。你们应该想想大事。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各在知时。我们时刻都要善观天下，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蒋介石看了两个木葫芦一眼，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

什么叫抗战么？”

这个题目的确新鲜而难答，陈、戴二人耗尽了全部应变辩才也答不出一个字。蒋介石忽地长高了许多。他张目作态，挥手作势，字斟句酌地为部下上课了：

“抗日本之贪得无厌，联日本之共同反共；用共产党的刀矛遏日本之忘形，止共产党之发展，期我党建国之必成。必须在两个战场上摆出两条战线，做长期战斗之准备。只在地图上考虑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是不行的。”

陈、戴二人连连称是，似乎还未吃透其中的奥妙。蒋介石又从文件夹里摸出一纸电文，满意地一笑：“看看吧！张荫梧这个人还是有脑筋的。”

张荫梧是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他策反了冀中军区第二支队归属民军之后，柴恩波率领这支队伍投敌了。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责备张荫梧统属不周，有失职守。张荫梧以“顺非而泽”的本领，给蒋介石回了个电报：

“柴恩波为保存实力，实施曲线救国，已与日方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倚日人之扶持，借日人之武器，夺八路之地盘，实际仍为本党工作。……”

陈、戴二人看完了电文，又是连连称是。蒋介石却加了一句赞语：

“曲线救国论。这个发明权属于张荫梧。修辞转告敬之，每月发给河北民军的军饷不应是十万，应是二十万。”

共产党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凡是主张抗战到底和全面抗战的人，都赞成，都高兴，都受到鼓舞。但流言蜚语也不翼而飞：“共产党武装是产生摩擦的根源”，“共产党势力发展得快，把统一战线中的一些人吓跑了”等等。

周恩来一到了武汉，便成了许多好心记者和别有用心的记者们共同追逐的目标。他从武汉大学回来，一屋子记者已经恭候多时了。不等周恩来坐稳，一大堆问题都提了出来。周恩来睿智的目光平静如水，他微蹙着剑般的浓眉，扬着冷峻的脸，迎着射来的利箭，淡漠地回答：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摩擦。首先我声明：共产党是不想也不去搞摩擦的，连十年内战也不是我们想打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十年内战和现在的若干摩擦？谁也知道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就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当两党共同遵守并实行的时候，不是搞得很好么？1927年‘4·12事变’，大刀砍到了共产党人的脖子上，共产党懂得了敌人手上有刀，我们也要有刀。这才有了红军——八路军的前身；以前并没有个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七·七事变’后，两党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但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即还没有一个从抗战到建国的共同纲领。如果有这么一个共同纲领，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那还有什么摩擦呢？”

“国民政府只给了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为什么八路军无限扩大，这不是要拥兵自重，别有居心么？”周恩来没有抬头也知道这是扫荡报记者放出的毒箭。

“对于这个问题我得反问一句。中共军把华北广大的国土丢给了敌人，八路军和武装的人民去从敌人手里抢回国土，有什么不好？八路军是抗日的武装，用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不要国家发饷而坚持抗战，有什么不对？两千年前的商鞅都懂得：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难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敌后人民起来自救的自由也没有么？”周恩来心平气和地回答了反动记者的挑衅，使场上好多记者不由得点头称是起来。

“我再提一个问题；既然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就应该取消共产党，随从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应另立旗帜，淆乱视听。”

“这个问题提得好。本党说的愿为三民主义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也不是虚言假意。但我们说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是周佛海的三民主义，汪精卫的三民主义，或别的牌号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其特点在于有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本党现在的言行，完全没有越过这本三民主义的范围。”

义正辞严，落地有声，挫败了敌人的邪气，擦亮了好心人的眼睛。屋子里沉静了。周恩来的眼睛向四下轻轻一扫，敌人低头回避，友人昂首企求，他们总希望周恩来多说几句，让心上更加透亮。

周恩来不负众望。因为他知道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盲目地寄希望于蒋介石的不要人民起来的片面抗战，不明白最后胜利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武装人民的全面抗战。

“大家暂时不提出问题，我利用这点时间补充说两句。第一，兵民是胜利之本，广泛发动群众、给人民以武装抗日的自由，全面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要努力纠正片面抗战之弊。第二，汉奸亲日派仍很猖狂，投降危险仍然存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才能制止投降危险。道路仍不是平坦的，前途是光明的。”

袁仲贤、张郁光在这个课堂上又当了一次旁听生。特别是张郁光听一次有一次收获，增加一层快慰。可是，天下事总是那样奇怪，一水之外又有水，一山之外又有山。张郁光的思想不是更清楚，而是更加复杂了。他看着周恩来轻松地迎着万箭齐发，信手地把它们推将出去，以四两拨千斤的招数化险为夷，心中自然升起一种敬慕之情。

周恩来照旧持着平易随和的态度送走了众人：他颌首躬身，给朋友送出温暖；他坚持原则，使敌人碰在高墙。守时，无懈可击；攻时，无坚不摧。他常是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泉之下，使敌人无从捉摸，使朋友心悦诚服。在张郁光的眼里，他是天人。

周恩来回过身来，袁仲贤、张郁光还站在原地未动。他知道“这二位肚里还有事”，微微把头一摆，指挥着他二人坐下。

“枪战要打，舌战也要打，这就是工作。”周恩来说：“在敌后也是一样吧？”

“一样，一个样！”张郁光说：“不过，您处纷乱复杂之中，如天马行空，不为物使，真所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我们则常是见目忘纲，见树忘林，忙忙碌碌，若明若暗，满脑子里都是芒刺。”

“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矛盾是无所不在的。嫌不得，怕不得，遵道而行，纲举目张。”

“我念了个大学毕业，努力求道，反而越弄越糊涂了。有书经之道，

道德经之道,大学之道,墨家之道,法家之道……到底我说不清道是什么。”

“道,就是规律。古人讲道,有许多接触了矛盾运动的辩证法,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懂得完整的辩证规律。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不能责怪古人。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给了我们一个犀利的武器,这便是我们的道。”周恩来望了望文化水平不高的袁仲贤在发呆,望了望有文化知识缺实践知识的张郁光在发愣,有意地提醒他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必须学习。毛主席要求大家学哲学,尤其高级干部要学哲学。他把陈云等一伙同志组成了学习小组,规定了课本和学习进度,定期检查讨论。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们要说:不学哲学,不懂马克思主义。”

“恩来同志!”袁仲贤说话了:“我是个放牛娃出身,自从扛上枪,只知道拼命杀敌,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绝不含糊。这还不能算彻底革命么?说实在的,虽然学了点文化,从来也没跟哲学二字碰过边。我看,哲学就由你们大干部去学,你们用哲学指挥我们,我们听令办事就是。”

“仲贤,你懂哲学,你没有好好想,就以为哲学跟你未沾边。我问你:上级命令你带一个团去突围,你怎么打?”

“当然向敌人的薄弱部突击。”

“这不就是抓住了合乎实际的主要矛盾面?这就是哲学。”

“恩来同志!我总以为哲学的内容比这复杂得多。比如我在鲁西北,既有日寇为敌,又有汉奸、伪军为敌;既有进步国民党为友,又有顽固国民党捣乱;顽固派有时正面为敌,也有时敛迹表示团结;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有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抗日友军。在这样一个重重矛盾交错之中,我们常常感到穷于应付。”

“这种条件下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也有总结: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对于顽固势力一概消灭么?”

“顽固势力在当今抗日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两面性:有消极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摩擦的一面。我们的策略是:团结其消极抗日,打击其

反共摩擦。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顽固派一旦停止反共摩擦，表示愿意团结抗日，我们又要跟他们讲团结。所以，跟顽固派斗争，要讲求：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啊！我明白了，对顽固派也要讲点中庸之道！”张郁光做了个自作聪明的讲解。

“郁光！你熟读圣贤书，却有不求甚解之处。”周恩来说。

“《书经》上说：‘唯精唯一，允执厥中。’《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而不倚’。有理、有利、有节不正是中庸之道么？”

“我们讲的是中庸之正道，但不是庸俗的中庸之道，是辩证法的中庸之道。庸俗的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不辨敌我的抹稀泥，这是唯心论。《书经》、《中庸》上讲的‘中’，不是折中的‘中’，而是合乎矛盾运动规律的‘中’，合乎必然规律的‘中’；苏轼说：‘古之所谓中庸者，尽万物之理而不过’，是对的。最通俗的解释应是‘过犹不及’。”

“那么，《大学》上说的‘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又当怎样解呢？”

“这个‘极’与‘中’是异字而同义。‘极’指的是做到尽善处，尽善处就是合乎矛盾运动规律的‘中’，合乎必然规律的‘中’。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抓取和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从而正确处理问题。顽固派既然来犯，则理在我，我以‘犯人’处之，这正是‘君子用其极’的时候；人家停止了进犯，矛盾双方的关系起了变化，我们再继续‘犯人’则输理，便失其‘中’道。宇宙间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是问题。一切必然都以偶然的形式出现。这个简单例子包含着质量互变的关系。在日常工作的实际中，这种变化是无所不在的，非常迅速的，不下‘唯精唯一’的功夫，是不能‘允执厥中’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督促我们学哲学的原因。”

“恩来同志！我这个脑袋不是缺一根弦，简直不知缺多少根弦啦……”袁仲贤自叹才力不足。

“我却觉着脑袋里的弦又多又乱，不知从何弹起。”张郁光说。

“一个是实践多，理论少；一个是文化多，实践少。两个人都需要从理论上提高。我们既要领导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要领导人民建

设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大,不提高理论,光凭猛打猛冲是不行的。”

“我总希望能在领导身边,行动自由些。”张郁光说。

“领导不能永远把你们当婴儿抱着,扳着手指教数。那怕是善跑的名将,也经过扶墙走路的阶段,何况你们已经是能够独立行走的人呢。我知道鲁西北在催你回去,你恨不得用一天时间学会一生用不完的本领。那是办不到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客观的实际。”

周恩来说出了“送客”的话,袁仲贤和张郁光无可奈何地对望了一下,无可奈何地立起身来,无可奈何地翕动着嘴唇,总不肯说一声“再见”,因为这两个字太沉重,太牵肠挂肚了。

一缕对革命事业的忠悃之情,从这两个不太年轻的人的身上,连绵不绝地淌出。他们多么希望领导再多嘱咐几句,再多嘱咐几句……周恩来灵机来了,一个急转身,从皮包里掏出了几个文件:《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仲贤!中央已经决定派你和二十几位同志随郁光去鲁西北工作,你不要说‘恐怕不能胜任’。郁光你也不要怯场。有党中央的领导,一切险关都可以渡过的。这几本文件,要好好学习,结合实际去用。你们会长知识的。”

袁仲贤一看题目,知道是讲打仗的书,心想“这正合我意”;张郁光没打过仗,心想“是要学习兵书战策”。不过,张郁光怀疑这些书能否比“孙子兵法”、“三略六韬”之类的书更高明些。

“是的!我要学习兵书。这方面,我读的很少。”张郁光说。

“郁光!”周恩来郑重地说:“这是兵书,但首先不是兵书,是哲学。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当前的政治、军事的实际相结合,得出来的结论。古往今来,没有这样的兵书;没有用辩证观点,从政治的角度,像这样去理解战争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最杰出的论述。”

袁仲贤、张郁光又傻了,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地解说战争,因而把自己所理解的战争理论给冲跑了。一个新的空白要求自己去填充,又要从头学起。

周恩来看出了两人的心境,轻轻地点了一句。

“在每件新事物面前，都要从头学起；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就要学而不厌。”

(十三)关公转世

张郁光回到鲁西北、先向特委张霖之报告一切。张郁光像在武汉洗了个温水澡，浑身痛快，一再说：“此行收获很大。”张霖之一时未解清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问题，也给理明了。

“不是收获很大，是特大。”张霖之从心底上笑了出来。

“咱们怎么办？”

“先跟范老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政工会议，把周恩来、董必武等指示的精神贯彻下去。”

张郁光跟范筑先作了详细报告。范筑先最喜听的是：“发动群众不要满足于形式上的热闹”，“要以农村为重点”。他抱着《论持久战》等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他对身边的张郁光、姚第鸿、张维汉、王幼平说：

“政工会的事，你们去筹备。我要好好地看看毛主席的书。”

张郁光他们刚走到门口，范筑先又把他们叫了回来，要他们重新坐下。

“这次政工会议是很重要的。有张郁光带回来的宝贵经卷，经过学习讨论，会把大家提高一步。”范筑先说到这里，郑重地扫视了大家一下：“我想起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也在这个会上解决才好。”

“您说说看。”张郁光说。

“我是一心地要学八路军的。可忙了这多时间，却没有注意培养政工干部。我想成立一个政工干部学校，我当校长，张郁光当副校长，我挂名，他干事。齐燕铭当教育长，他有教育经验；周事明为训育长。交政工会上讨论一下，如果大家赞成，着手就办。怎么样？”

“这是好事，早就该办嘛！”张维汉表示赞成，大家一致拥护。

张郁光等一走，屋子里沉静下来。几本文件乱蹦乱跳，跳到手上，钻进眼里，弄得范筑先不知从何入手。

瞄了《战争与战略问题》，觉着新鲜、重要；瞅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觉着更新鲜，更重要；再一翻《论持久战》，简直进了百花园中，美不胜收。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书要一本一本地读。范筑先抓住了《论持久战》，放下了另外两个文件，抱歉地说：“你们二位先休息一下，我总要找你们谈的。”范筑先一下子全神贯注地钻进了书里，他边看边想着：

驳“亡国论”驳得好。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日本是小国，退步、寡助，中国是大国，进步、多助。中国决不会亡。但由于日本是强国，我们是弱国，又决定了中国抗战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路程，速胜也是不可能的。亡国论者与速胜论者“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

“这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管窥天，用锥指地。……”

范筑先回忆了“抗战必亡”、“再战必亡”、“三月可胜”、“半年可胜”的谬论。回想起，在上海投入了七十多个精锐师跟敌人作阵地战的损失，台儿庄打了胜仗之后，又调集几十万兵，想在徐州与敌人作战。可是敌人于1938年6月6日占开封，7日占中牟，炸毁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另一路敌人6月3日占杞县，4日占尉氏。这样对徐州进行了侧面大迂回，同时，摆出了进攻武汉的阵势。

“速胜论”者也看明白了：如果不迅速把徐州周围的几十万部队撤走，就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

蒋介石慌了手脚。范筑先也为此焦心。

范筑先看着毛泽东的文章，一则以喜，喜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看得明白有办法，中国不会亡；一则以忧：徐州周围危殆形势怎么挽救？武汉怎么保卫？范筑先越是心明眼亮，越是着急，他站起来，摸摸头上的汗珠，止不住地叹气：

“亡国论害人，速胜论同样可以败军亡国。委员长！你的参谋们……”

范筑先想知道蒋委员长的参谋们给他出了什么好主意。

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坦克、汽车、装甲车、自动推进火炮，上有空军掩护，在黄河南的大平原上，蜂拥驰骋，如虎，如狼，如豹……吞噬着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范筑先痛心疾首，坐卧不宁，手抓着《论持久战》当护身符。

通信员给他拿来一份《山东人》。

这个通信员哭了，因为他的家正处在黄泛区里头。

“司令！都完了，连爹妈也完了，呜……”

通信员哭出了声。

范筑先知道一定是《山东人》上报导了不吉利的消息，两眼迅速搜索。可不是嘛，大字标题，刺目惊悚：

“国民党花园口决大堤
三千平方公里成泽国”

原来一直持速胜论观点的蒋委员长，一看敌人突破平汉、津浦、陇海三路，迂回徐州，威胁武汉，惊恐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他接受了高参们的建议，于1938年6月12日在花园口把黄河大堤决开，使黄河大水南泛，把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1250万人陷入泽国，以便阻滞敌人前进；说“这是军事机密”，事前并未通知人民转移，致数十万人众被淹死，田舍淹没，无数人民流离失所……

一片汪洋，在一片汪洋里漂浮的人畜尸体，在一片汪洋里挣扎的人民……

范筑先落泪了。

“自作孽，自作孽……”范筑先发现了身边的通信员还在哭：“先回去，咱们设法打听你家的情况。”

范筑先从远远的河南黄水泛滥中把心神收回来，对于无能为力的事，只好搁下。他平息一下心气，重新读书。

“政治越进步，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对着呢。持久战要经历三个阶段，也对。外线与内线，包围与反包围，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犬牙交错变化多端的战争。好，说得好。“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是事物中最活